

经典作家篇之
曹禺篇

一篇难做的大文章

——从曹禺最看重的一封信谈起 □张帆

国传统”。还有人想跑到美国去。细菌学者凌士湘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继续埋头科学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他又答应了帮助贾克逊把细菌实验室运到美国去。

解放后，医学院回到了人民手中。贾克逊在逃回美国之前，为了得到一个软骨病人的骨头作标本，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一个中国工人的妻子。不久贾克逊是走了，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为了争取、教育和改造这些知识分子，党做了许多工作，但并不顺利。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经过两年多的事实教育和党的帮助，医学院里的大夫和教授们大都认清了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但凌士湘仍不相信，直到美国在朝鲜使用了细菌武器，使他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敌人利用了的时候，他才和一些人真正看清了敌人的反动本质。他决心要到朝鲜前线去参加反细菌战的斗争。

这样的一个故事梗概，内行人一看便知《明朗的天》是一出“说教戏”。它也的确是一出配合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说教戏。也可以说这是一出“主题先行”的戏，是概念出发的戏。

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这是曹禺的一贯主张，自认为熟悉知识分子的曹禺选择了写医务界的教授们，他的这个选题被周恩来肯定了，于是他的创作热情被燃烧起来，但他深入生活、采访结束后，却感到有些茫然了，感到无从下笔，他觉得他似乎又不太熟悉知识分子了。创作给他带来的不是兴奋而是痛苦。苦就苦在创作方法与过去不同。过去写剧本，出现在他脑海中的首先是一些人物、一些动人的场景，至于整部戏是什么样子，他似乎都还想不起来。比如他写《雷雨》，他首先想到的是鲁妈在暴风雨的夜晚逼着女儿四凤“起誓”的那场戏，然后他再构思这场戏的前因后果，他也并未明确地想到要写出“反封建”的戏。主题是在观看过演出后悟出来的。但他写《明朗的天》可就不同了，写之前曹禺就明确了创作意图——要写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其所有的构思都要服从这一总的意图。说白了，就是要编造紧贴这个主题的人物和故事。而当时的背景又是什么情况呢？1954年，思想战线正在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这之前的4年里还有“三反”“五反”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整风运动、“肃反”运动等等。可以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还敢说真话吗？曹禺对知识分子的所谓“采访”能得真正的收获吗？他真的熟悉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吗？因此他说：“我写《明朗的天》时觉得很难写，我在协和（医院）搜集了不少素材，但是怎样提炼这一大堆材料，很吃力。要知道，我当时也是要思想改造的，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嘛。那么我写别的知识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彻。”尽管我当时的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硬着头皮去写的，但现在看来，是相当的被动的，我那时也说不出是怎样的一种味道。”

听了曹禺的自述，我们自然就会明白这出戏为什么没写好。尽管这出戏得了那么多的一等奖，但最终还是没有保留下来，自1954年12月到1955年4月初，北京人艺将该剧一共有演出81场，此后北京人艺就再没演过这个戏。

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第二出戏，也是他“文革”前写的最后一出戏是《胆剑篇》。这出戏是他和梅阡、于于是共同创作，由他执笔完成的。剧情是家喻户晓的越王勾践卧

薪尝胆的故事。创作于1961年，那正是我国最困难的时期，中苏关系破裂，几天的时间里，他们的专家全部撤走，许多重点工程陷于瘫痪，再加上天灾人祸，粮食欠收，遍地饥荒，饿死的人有几千万！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那个时代历来不向外国求援的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戏剧界出现了许多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戏，话剧《胆剑篇》便是其中之一。但是政治热情无论如何替代不了艺术创作。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反左而反右，反右倾的扩大化又把一大批敢于讲真话的仁人志士吓回去了，直到1961年的“新桥会议”，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才算出了一口气，胆子稍微大了一点儿，这才有了短暂的艺术繁荣。事实上包括曹禺在内的艺术家们仍有余悸。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胆剑篇》虽取得一定的艺术成就，但它不是也不可能完美无缺的。周总理看完戏说：“《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周恩来的话虽切中要害，但他的心里也是明白的，束缚和迷信是不容易摆脱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被整怕了。《胆剑篇》前后演出57场后宣告结束。全国的卧薪尝胆热也大降其温。

第三出戏是《王昭君》。这又是一部命题剧作，出题者仍是周恩来总理，他希望曹禺能写一部歌颂民族团结的戏，而且就写王昭君。

“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戏曲舞台上有很多版本。曹禺有一个创作原则：别人用过的写法决不用。于是1961年他在乌兰夫的邀请下，深入内蒙古自治区体验生活，搜集民间素材。许许多多凝聚着蒙汉两族人民友谊和美好愿望的富于幻想的传说，大大激发了曹禺创作的想象力和创作激情，他很快就写完了剧本的前两幕。正当他想继续往下写的时候，政治气候又变了，阶级斗争的弦儿又绷紧了，紧到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主题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又名《祝你健康》）应运而生，而且全国的各个剧种的院团几乎无一不上演或移植该剧，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曹禺感到再写历史剧是不合时宜的，他将未完成的交响曲——《王昭君》的前两幕锁进了抽屉（尽管锁了，“文革”中还是被造反派抄走了）。

“四人帮”粉碎后，时任科学院院长的胡耀邦同志会见了曹禺，希望他能写一部科学家与“四人帮”斗争的剧本。曹禺允诺了。当时北京人艺的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选派了于是之、梁秉堃和笔者本人协助他工作。由于曹禺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周总理保了一下，所以自1971年后他基本上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对外界的情况了解不多，所以对科学界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体验生活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三位的头上。我们先后去了沈阳、大连、烟台、青岛、徐州市、杭州、苏州等地，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回京向他汇报，然后我们又一起参加了“全国自然科学大会”和“全国科学大会”，访问了众多的知名科学家，这些都是曹禺的老朋友，有的还是清华的校友，多年不见，十分亲热。但是真的写起剧本来的时候，曹禺又遇到了“怎么写”的困难，具体的就不在篇这章文中详述了。但是停顿下来也不是个办法呀。忽然有一天，我们在曹禺家研究创作时，对我们说：“剧院的专案组前两天把我‘文革’前写的《王昭君》前两幕退给我了，我念给你们听听。”我们几位一听，说：“好哇！”梁秉堃忙从曹禺手中拿过剧本说：“曹老，您岁数大了，我来读吧。”曹禺同意了。梁秉堃读了没一会儿，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孙美人的形象迷住了，接着又被王昭君、盈盈、戚戚的形象所吸引，两幕戏读罢后，我

们不由得鼓起掌来！心说：这才是曹禺啊！大作呀！此时的于是之早已明白了曹禺的意思立即挥笔写下十个大字递给曹禺（因曹耳聋），上书：“不要避己之长，就己之短。”我们大家也随之说：“您老别写科学家了，就接着写《王昭君》吧，这才是您的强项。”这样曹禺顺理成章地丢弃了写科学家的苦脑，改而继续《王昭君》的创作。上述这些虽是题外话，但确也反映了曹禺当时的创作状态。

1978年，曹禺已68岁，但他不顾年事已高，在女儿万方的陪同下奔赴新疆体验生活，进一步搜集素材。为完成这部电影，昭君诗、昭君戏、昭君的事迹和传说，他想尽一切办法找来读。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要写一个有新意的王昭君，他说：“我要擦掉王昭君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真正的光彩。”“我写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气，有胆识，愿意为民族和睦和当时汉朝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一生。”“她嫁到匈奴，就爱上草原，她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就真心地爱他，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她刚毅，又温柔；她耿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因为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

《王昭君》首演于1979年7月31日，连演100余场！该剧还是大陆话剧首访香港的剧目，也轰动了香港。舆论界、媒体好评如潮。搁笔十余年之后的曹禺又写出了新作，一时传为佳话。对《王昭君》赞许的评论，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有资料可查。在一片赞扬声中，有的专家也对该剧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认为曹禺把王昭君的形象“写的太高了，不真实”，写得太“理想化”了，有点像维护民族团结的形象大使，像外交家。有评论这样说：“（《王》剧）的美中不足则在于：第一是剧中的戏剧色彩不够浓厚，‘出塞’一段情节空白；第二剧本缺少匈奴人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第三虚构有时距离历史真实较远。”

曹禺的王昭君之所以写的“革命”了一点，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剧本完成并发表于1978年11月，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也尚未开始，极“左”思潮还严重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曹禺的创作思想不可能完全解放，对他王昭君形象的所谓“拔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在所难免的。但无论如何《王昭君》也应算是曹禺比较好的剧作，我们不能苛求曹禺的所有剧作都像《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那样精彩，那样久演不衰。实际上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哪怕是文学巨匠的作品）都不可能部部精彩，部部不朽。

黄永玉说曹禺“你泥泞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等等这些话虽然中肯，但他却忽略或是不太了解曹禺所处的环境。再者写戏和画画可不一样啊，触及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要比画作家危险的多！从另一个角度说，曹禺在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不知担任了多少社会工作，他头上的官衔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清，像中国剧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等这些职务，使他不得不经常参加政务活动和社会活动，有些是根本推卸不掉的。晚年，他住进了北京医院，一住就是8年多！就是在医院里他也很难安静下来，找上门来求他题字或出席各种活动的人不知有多少。他的心态一直处在矛盾中。这大约就是黄永玉所说的：“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困！”吧。巴金也对曹禺说过类似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一两本小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巴、黄二位老友的意见都是对的，但他们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说这些话的，他们没有设身处地的想曹禺的处境和心态，不客气地说：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好了，不再多说了。

总之，曹禺之所以那么看重黄永玉的信，并把它悬挂在厅堂之中，说明他自己的心里还是明白的，是敢于承认自己的弱点的。

曹禺在解放后新创作的三出戏虽不是北京人艺像《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那样可以随时轮换上演的保留剧目，但在北京人艺的演出史上，也是比较优秀的剧目。对于艺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宽容一点为好。

抓人就是后来惊动了周总理的“揪斗彭罗陆杨”事件。他们突袭抓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有一批所谓的走资派、黑帮和我爸爸这样的“反动文人”。周

总理过问后，听说抓的人里还有曹禺，就说：“你们抓曹禺干什么，他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样，过了两天，也是在深夜，他们把我爸爸送回家来，对他说：“你要是敢和任何人说出你去了哪儿，看到了什么，小心你的狗命。”我记得当时妈妈问爸爸这两天的遭遇，爸爸想说却不敢说。我小小年纪却能深深地感觉到爸爸的可怜，于是跟他说：“快吃药，快睡觉。”爸爸接过妈妈递给他的安眠药，立刻吞下去。爸爸本来就有神经官能症，睡眠不好，“文革”期间严重失眠，只有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要越吃越多。

7岁时我该上学了，妈妈的意见是让我上离家比较近的府学胡同小学，我姐姐就在那里上学。可爸爸却坚持把我送到景山学校念书。景山学校离我家很远，中间还要倒车，我从7岁起就脖子上挂着月票挤公共汽车。因为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坐车，售票员叔叔都认识我这个小家伙了。为了见到那位亲切和蔼的售票员叔叔，爸爸还和我一起坐车，向他表示感谢。这样的经历对培养我的独立精神十分有益。而景山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英语课也使我日后受益匪浅。

1968年底，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那时我还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我爸爸被打倒，戴着高帽子站在台上被斗争。我家的大门口刷满了打倒我爸爸的大标语。姐姐在学校里参加运动，我只能整天待在家里与父母分担他们的痛苦。红卫兵多次到家中抄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革命群众分成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对我爸爸这类所谓黑帮怀有同情，另一派是造反派则恨不得把他们置于死地。当今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大导演林兆华当时就是北京人艺的保皇派。我爸爸原来的司机也是保皇派，他和剧院的工人师傅早早来到我家，把我爸爸的书房贴上封条，盖上了他们红卫兵组织的大印，这样我爸爸的书才得以保住，没有被可怕的造反派毁掉。

我记忆最深的是1966年底。一天深夜，我被砸门的响声从梦中吓醒，原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来抓我爸爸。那时我才11岁，吓得不敢动弹也不敢哭，眼看着他们把我爸爸从床上揪起来，厉声呵斥，让他跟他们走。我爸爸只穿上一件棉袄就被他们推推搡搡地带走了。我妈妈问他们要把爸爸带到哪儿去，他们理也不理。那次深夜

他给我这片自由的天空

□万欢

心心相印。爸爸还给我做过烧茄子，做得还挺好吃。我这个小女儿大概是唯一吃过他做过的饭的人。记得有一次爸爸看错了钟，早上4点就起来给我做早点，把我从睡梦里吵醒，我懵里懵懂对他发脾气，爸爸生气了，从此早上再也不起来给我做早饭了。

1976年“四五”运动，北京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我和姐姐还有朋友们天天往天安门跑，爸爸在家里急切地等着我们回来，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又兴奋又害怕，不知人民和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10月份的一天，我去朋友家玩，他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偷偷告诉我“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我赶紧跑回家去。那时我爸爸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几乎和废人一样，我推开家门，冲进他的屋子，他躺在床上，我兴奋地告诉他：爸，咱们得救了。

爸爸不信，是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他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他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爸爸后来告诉我，他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们终于从大地监狱里逃出来啦！

1977年恢复高考，我一心想上大学，爸爸特别支持我。他希望我学医，学自然科学，我却在医学和外语两科之间摇摆不定。我每犹豫时都去征求他的意见，不夸张地说一天起码要问他三遍以上，不停地磨他：“爸，你说我到底学什么？学医还是学外语？”他说：学医。我就把一整套数理化的书摆到桌上复习。可过了没几个小时我又犹豫起来，又去问他，一遍遍地问，其实内心是想听到他说：

学外语。他被我磨得没法子，就说：只要你喜欢，学外语也可以。我立刻把数理化的书收起来，把外语书摆满一桌子，开始复习。我就这么一会儿医学一会儿外语折腾了不知多少回，来来回回搬书，我这样的女儿真是太考验他的耐心了，可爸爸对我从来没有厌烦，每次都很认真地和我谈，商议，分析利弊，说服我，最后还是爸爸帮我下定决心学医。

第一年高考我落选了，很沮丧。爸爸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一个劲儿鼓励我，让我第二年接

着再考，还去书店给我买来好多医学方面的工具书，为我包好书皮。我几次想打退堂鼓，他语重心长地劝说，督促我坚持下去。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医学院，报到那天，爸爸手里提着新买的暖水瓶，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看着我上车，看着汽车远去。车站上，爸爸的身影越来越小。

我上大学后，爸爸和继母李玉茹结婚，老两口时常在上海居住。我和爸爸相隔千里之遥，那些年爸爸给我写了多少信啊！甚至比平日里的谈话还要多。每一封信都充满深深的父爱。爸爸对我说：我爱你，你，只有说真话，才是真爱你。

他要我“耐住寂寞，耐住孤独，在寂寞中多读书，不要皱眉头把读书当成苦差事，要创造对学习的兴趣”。他还说：“你要有兴趣，真有兴趣，而有兴趣要先从自己肯下功夫才行。兴趣是从实际出来，如只图个人的快乐便做事事苦恼，因为个人的快乐与享受是无止境的。我不是说你要做个苦行僧，但必须自己有志气，再有，你的打算要符合自己的基石，不要拿别人的环境，尤其是自己认为比自己优越的环境来比，那就越比越苦恼。你喜欢干的事情看准了，就要坚持下去，任何事情总有好与坏两面，看你从哪方面看。”

“有了决心，有了自己的选择，才能找到机会。但‘机会’多少有些碰大运的意思。主要在于自己下决心，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去奋斗。整日在盘算而不能下决心，多半因为看不远，怕困难，怕吃苦，自己有了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各种思虑，那就永无宁日。”

我保留着爸爸给我写的每一封信，在我和姐姐当兵的时候，他写给我们的信都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每一封都有五六张纸之多，最长的一封信是15张信纸。最近我又拿出爸爸的信，看着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字迹，我觉得爸爸就像一直在看着我的生活，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直到今天依然指导我的人生。

我有一位充满感情又有责任感的爸爸，在我们的成长中，他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用他对我们的情感感染、鼓励我们好好生活，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从小到大，爸爸从来没打过我，有时批评的言辞激烈一些，我都会哭。长大以后，每当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我都要和爸爸说，

包括个人情感的问题，他的基本态度是不干预，但是会给我一些中肯的提醒。他告诫我：“凡是一相情愿的事，都不会有好结果的。”还对我说：“凡是逆于常情的事与人，必然有一定的道理，你要认真想想。”

在生活中，每当我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向他询问的时候，他从来不是立刻回答我，而是说：来，咱们一块查查。父女二人或查字典或查百科全书，一定把问题的答案弄得确确实实才罢休。他给我买了各种字典和工具书，很多书我至今还在手边使用。

终于有一天，我要出国留学了，爸爸是多么为我高兴，又是多么留恋我啊！他拉着我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嘴上念叨着：“我的小幺女，我的血，我的小骨头……”他还用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唱起他即兴编的歌词，“一条大河长又宽，我和女儿站在河两边，我想我的女儿，女儿也想我呀，父女二人脸上泪流涟漪，泪流涟漪……”

爸爸高兴起来也很爱唱歌，但他五音不全，是个左嗓子，唱歌跑调，然而他声音洪亮，充满热情。躺在病床上，他给我大唱“九一八”和《国歌》，还唱意大利的民歌《我的太阳》，直唱得我哈哈大笑。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目光里闪着欢乐的光芒，跑着调，大唱特唱的样子。

爸爸老了，患了肾功能衰竭，住进医院。我从国外来看他，只是和他聊一些闲话。其实我心里仍然有很多对人生的疑问想向他倾吐，问他该怎么办。可看着他衰老的样子，我不忍心再用自己的问题去打扰他，让他为我操心。可是我觉得爸爸其实完全了解我的心，对我的思虑心领神会，但他不愿点破。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坐在爸爸身边，他的手疼，我给他捏着手，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说：“儿啊，不如事事顺心，可与人言无二三。”他还给我写过一张条幅：“牢骚太盛防肠断”。我把它裱起来，放在镜框里，一直摆在我的桌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爸爸对我的爱有多深，他是多么小心地爱护着我。直到今日，我遇事要作决定时还常常问自己，爸爸会怎么想，他会赞成我的决定吗？

爸爸离开我14年了，但我觉得他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延续着。在我的工作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我相信他能知道，在他给我的这片自由的天空里，爸爸永远在看着我。

本专刊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协办